从幕后走向台前：信息科学领域自我民族志研究回顾

郑光纯，张钰浩，闫　慧

（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目的／意义］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关注研究者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亲身体验的人类学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唤起式”的写作实践，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尚未得到广泛关注。［方法／过程］本研究从研究主题、运用方式、优越性及局限性等方面归纳了信息科学研究中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的研究。［结果／结论］自我民族志的优越性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手段和研究发现呈现方面，其适用性程度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属性。

关键词：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信息科学领域；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48（2022）02-0040-08

引用本文：郑光纯，张钰浩，闫慧. 从幕后走向台前：信息科学领域自我民族志研究回顾[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2，34（2）：40-47.

1　研究背景

民族志（Ethnography），又被译作人种志，来源于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具有写作文本式产物和研究方法这两种意义。作为一种文体，民族志是一种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1]；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一般指的是20世纪初由马利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以“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科学方法，先后经历了3个阶段：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业余民族志；通过学科规范支撑的科学民族志；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重新思考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民族志。民族志的研究者采用主位研究方式，以亲历和观察的方法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2]，数据收集在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开展，除了参与式观察以外，研究者还可以使用深度访谈、影像资料或者相关物件作为其数据来源。随着信息科学领域中“以系统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民族志方法因其以“第一视角”融入用户群体，深刻洞察用户需求，得到了信息科学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受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反身性方法的影响，许多采用民族志作为其基本方法论的人类学家开始转向采用叙事方法来开展他们的研究[3]，研究者开始尝试在叙述中突显个性化，通过描述自我的亲身经验来表达自我意识、表达和讨论文化，深化对文化

收稿日期：2021-10-3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中国背景下数字贫困消减行动研究”（18BTQ007）

作者简介：郑光纯，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张钰浩，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闫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的解读，这种“唤起式”写作实践被 REED-DANAHAY 被命名为“自我民族志”[4]。GUZIK 认为自我民族志本质上是自传和民族志的融合，虽然自传是一种文学流派而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它们的内核都在于“叙述”[3]，但是 REED-DANAHAY 等学者突出了个人与文化在自我民族志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自我民族志是一种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上，通过探索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自己在一种文化所处位置的研究样式和写作形式[4,5]。自我民族志中数据主要来源于研究者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亲身实践和自我意识，表现形式可以是日记、录音、随笔等，除此之外，研究者也要广泛地收集各种形式的信息，比如照片、视频、新闻报道等，这些都可以为后续分析提供辅助。

自我民族志在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相比民族志方法中有意将研究者当成背景，自我民族志更关注研究者关注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亲身体验[6]。信息科学领域根植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人员常也是职业人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们往往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的受众，比如档案管理员也会需要和利用人事档案、卫生医疗档案等。自我民族志中的作者既是研究者，也是研究对象，在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具备运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鉴于在信息科学领域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不多，学界对于该方法的应用并不常见，本研究尝试对信息科学领域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背景、主题、自我民族志方法具体运用方式、优越性及局限性等，阐释自我民族志方法在信息科学领域应用的典型个案及在特定领域中契合度更高的研究主题。

2　研究设计

为了全面了解自我民族志方法在信息科学领域的运用，本研究对国内外的文献都进行了检索，检索步骤如下。

（1）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自我民族志或含自我人种志或含自传民族志为检索词，检索条件限制在“主题”或者“篇关摘”或者“全文”中，文献分类目录限制在信息科技，返回检索结果 46 条；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 autoethnography 为检索词，检索条件限制在“主题”或者“标题”中，类别限制在“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返回检索结果 40 条。检索时间均截至 2021 年 6 月 7 日。

（2）两位研究者对 86 条检索结果进行独立筛选，进一步确定研究样本的组成，纳入标准为：①属于研究类文献（主要剔除了综述类文献和没有展现完整研究过程的海报类文献）；②属于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范畴。研究者对意见相左的文献进行了讨论而后达成一致，最终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18 篇，均为英文。

3　样本情况

从发表时间的分布来看（图 1），最早的文献出现在 2010 年，米歇尔斯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自己作为一名 LIS 专业的学生在专业（法学）图书馆的个人经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7]，是信息科学领域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的初步尝试，体现了未来更多尝试的可能性。自 2013 年开始，每年都会有至少 1 篇相关的论文被发表，2016 年到达了近些年的巅峰（4 篇），整体来讲在信息科学领域能够规范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指导研究的数量仍然较少。从发表作者和所属机构地区来看，安德森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发表了两篇论文；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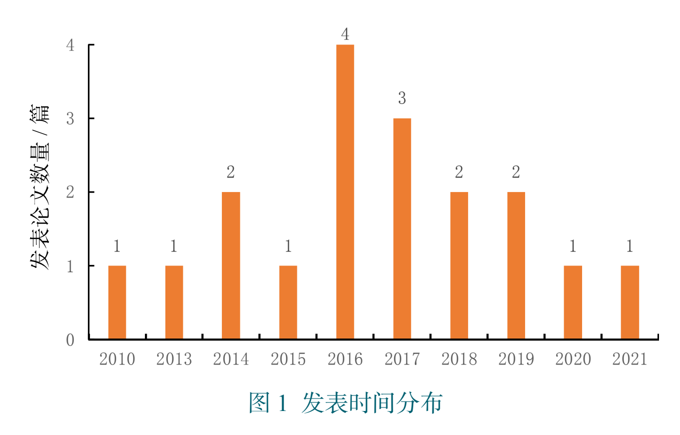


图 1　发表时间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 years

所属机构的地区主要有 4 个，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从收录期刊(平台)来看(表 1)，*Information Research –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和 *Library Trends* 是主要阵地，总共收录了 9 篇论文。

表 1　期刊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期刊（平台）名称	收录数量/篇
Information Research -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5
Library Trends	4
IFLA Journal	2
The DATA 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1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1
Preprints	1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s	1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1
Archival Science	1

笔者在认真研读过 18 篇文献样本之后，将研究背景分成了 3 类，分别是工作情境、日常生活情境和突发事件。如表 2 所示，工作情境下研究者通常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出版业从业者、档案工作者、图书馆员、老师等）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机构相关服务，更好地实现职业价值。在日常生活情境下，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超长跑、徒步）和医疗健康（妊娠失败、临终关怀、慢性病护理等），研究者会把作为一名 LIS 职业人员的敏锐度代入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理论，在理论中指导规范实践。最后一类是在突发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洛帕托娃和斯麦丽在 2012 年 10 月飓风“桑迪”来袭的过程中，信息需求、信息源和信息行为的变化，提出了在危机下信息行为的模型[8]。

4 自我民族志的应用方式

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自我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表达方式和写作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至今还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判一个研究是否恰当应用了自我民族志。沃尔认为，自我人种志与其说是一种定义明确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哲学，因此在撰写自我人种志文本方面仍有相当大的自由[23]。自我民族志通常以第一人称书写，艾丽斯列举了一些可能的自我民族志表现形式：短篇故事、诗歌、小说、摄影随笔、个人随笔、期刊文章和社会科学散文等[24]。

在实际应用中，自传式的故事讲述和个人日记都是常见的文本形式。研究者在回忆自己一段较长的人生经历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体验时偏好用自传式的故事呈现。蔡和特若斯讲述黑人进入 IT 领域的经历[10]，库克在 LIS 课程教学上的实践[15]，以及巴登霍斯特等的学术出版经历[11]都使用了这种文本形式，并且他们都

表 2　研究主题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研究背景	研究对象身份	研究主题
工作情境	社区大学信息共享空间职员[9]	巡回参考咨询如何帮助解决学生在信息共享空间中遇到的挑战
	黑人 IT 从业者[10]	信息技术劳动力多样性
	出版人员[11]	学术出版的过程和要求
	档案工作者[12]	历史学家和档案管理员之间在创建档案中的合作
	图书馆馆员[13]	公共图书馆在建立韧性社区中的角色
	多重身份[7,14]	图书馆如何完善信息服务
	教师[15,16]	信息领域相关学科的教学实践
日常生活情境	护工	慢性病患者[17]、临终病人[18]及其家人的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
	妊娠失败的妇女	档案从业者对自我职业责任的反思[19,20]
	体育运动爱好者[21,22]	运动过程中的信息行为
突发事件	飓风亲历者[8]	危机下信息行为模型

选择将这段叙述作为文章的一部分详细展示。

个人日记在记录形式上更类似于传统民族志所使用的田野日志，通常由研究者在实践或调查的过程中持续记录，但自我民族志中的个人日记具有明显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的特征，研究人员（即“我”）的思考是研究的焦点[25]。克莱默[9]在社区大学信息共享中心的实践很好地展现了这一区别：她在记录咨询日志之前制订了详细的指导手册，并借鉴了大学已有的评价量表，这是传统田野调查中常见的做法，但她对量表进行了改编，修订后的量表关注图书馆员的知识和处理咨询的方法，咨询结果字段也是图书馆员的角度出发认为的问题解决程度，由此我们判断该研究确实属于自我民族志的应用。个人日记因需要持续记录，通常会产生体量较大的文本文字，研究者一般不会选择直接在文中展示讨论，而是将其作为文本分析数据[14]，结合内容分析[8]、情境分析[25]等方法深入挖掘关键要素。

自我采访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个人日记，它的特点是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随时展开，启发式地记录实践中的灵感。例如在长跑的情境下，研究者为了进行自我采访，在智能手机中安排了提醒，从比赛开始的一个小时启动采访程序，每 45 分钟提醒一次自己回答开放式问题[21]。

诗歌的表现形式在 LIS 领域并不常见，但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中一直有得到关注。理查德森认为诗歌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和呈现形式，将私人的情绪与感受具体化后向其他人展示，写社会学诗歌是一种反思性的体验[26]，而这与自我民族志的特点一致。米歇尔斯在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在大学图书馆的个人经历时用到了诗歌的形式，他的诗歌分享了在图书馆的关键事件，传递了自我与图书馆系统的关系[7]：

I am a student	我是一名学生
A researching scholar	一位研究者
I came to your library	我来到你的图书馆
Your collection of knowledge	你的知识集合
I did not know	我不知道
I did not intend but . . .	我不是故意的，但
I became the other	我变成了其他人
A subject outsider	一位主体身份的局外人
A dislocated voice.	一个错位的声音

米歇尔斯还提供了一种非文本形式的自我民族志表现形式：视频。视频与文字叙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可以让观众(读者)了解到所收集数据的基本内容，而视频作为一种更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其优势在于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研究者的体验。“门的嘎吱声、等候椅和移动的钢笔都增加了作品的气氛”[7]。

实物也可以成为自我民族志数据的一部分。施莱塞尔曼–塔兰戈在自己的“妊娠失败档案”中除了记录了自己的感受经历外，还包括了医疗收据、处方甚至是药物的空瓶[19]。这些实物之所以属于自我民族志的一部分——而不是自我民族志的补充——是因为它们不仅传递了客观的时间信息，也传递了研究者的主观情绪。

需要补充的是，自我民族志不一定只涉及单一主体。在合作式自我民族志（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的实践中，具有相似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开展合作，在撰写个人故事之外，他们还会分享彼此的故事和见解，并把交流的内容也作为自我民族志数据的一部分。合作式自我民族志是集体参与的自我研究，是独立的反思性写作与集体互动交织的过程[17]。研究者之间电子邮件的交流内容是这类研究中的重要文本数据[12]。就具体实施过程而言，合作式自我民族志包括确定个人故事的主题框架，研究者的独立写作，讲述、复述和分享产生的故事，合作过程以相互信任为前提，以反复和协商的方式演变[17]。

5　在信息科学领域运用自我民族志的优越性

像自我民族志这样的自反性方法论在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太多利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自我民族志对信息研究的潜在贡献。在本文选取的 18 篇样本中，大部分作者都阐述了选取自我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5.1 研究视角——双重身份下的独特见解

自我民族志最大的特色即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传统民族志的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介入局内人的生活来研究其文化，而自我民族志研究者既是开展研究的局外人，又是呈现文化的局内人。双重身份的好处在于，比起普通的研究对象，学者自己作为研究对象时能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自身活动中与信息相关的要素。在这种独特视角的帮助下，研究者可能发现更多值得关注的真实问题，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获得可信的体验和数据，随时根据真实的被采集数据的体验，敏感探测到研究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的冲突和模糊空间，收集到能够回答研究问题高质量的素材和证据，不同于其他研究在研究方案与数据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重身份高度统一的自我民族志可以做到研究方案理想的数据与实际数据质量之间的高契合度，并伴之以换位思考之后的恍然大悟与豁然开朗。

“我们作为信息研究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双重角色为我们自己的自我民族志调查提供了动力，前提是我们共同相信我们作为信息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应该使我们能够体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姑息治疗情况下不一定敏感的事情。”[17]

双重身份的优势还体现在，研究者同时作为理论成果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他们可以便捷地检验结论的适用性，实现理论成果到实际意义层面的转化。比如当研究问题聚焦于图书馆服务时，自我民族志带来了图书馆员视角下对图书馆服务的审视，克莱默[9]对学生常见困难的总结和对策，以及布莱克本[13]对图书馆如何提供有效的跨文化服务问题的探讨，都展示了这种反思式的观察与参与对完善图书馆服务的借鉴意义。

5.2 研究手段——探索新领域的有力工具

民族志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开放性的方法论，自我民族志继承了这一特点，适用于发掘那些尚未体现在已有研究中的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民族志研究不带着任何假设或者猜想，深度融入到研究对象的文化环境和生活工作学习场景，允许对现实情况进行发散性阐释、对资料进行选择性阐释[27]，以开放和好奇的研究心态、对研究问题得到新鲜答案的追求而探索复杂的社会活动与未知的学术领域，发现和描述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和学术概念的新体验，归纳新的抽象概念、变量及其关系。自我的概念与个体生活同样是复杂且动态的，自我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分析手段帮助研究者进行探索和理解，发现已有抽象概念无法描述与解释的自我方式呈现的社会现象，以参与观察的局内人身份和行动研究带来实际改变的决心，将自我改变与理论进化融合到一起，在进行开拓性工作中借助自我民族志获得探索和定位新领域的经验。

例如，麦金泰尔对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之间数字化合作的探索中，作者本人就经历了从历史学家和档案最终用户体验服务到与有经验的档案员合作制作小型数字档案的转变，在探索不确定的合作道路的过程中，对自己身份转变历程的反思显然为档案数字化合作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宝贵经验[12]。

5.3 研究呈现——共鸣式的文化唤醒

与传统民族志主要关注整体不同，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体呈现的文化，探究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一方面，自我出发的叙事手法能更容易地带领读者进入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活动，体会情感、思考等种种具有启发性的细节，使得其他学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研究问题、研究过程与研究发现，更有望获得读者的文化共鸣（当然并不能期望所有读者都能获得这种共鸣），从而强化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更容易激起对作者呈现研究成果的认同，或者激发其他哪怕是做出不同研究结论、但拥有相似文化体验的研究者的兴趣。另一方面，研究采取以个体为中心的理念时更容易关注到群体内的个体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归因和解释能让读者以小见大：从个体出发理解个体所处文化的特点，理解同样的学术概念或理论框架在解释个体差异中的可能性，以及发现个体具象层面的差异带来的理论创新空间。这一以小见大的过程，是从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与审视到对文化经历的展现和反思的过程，即个体

差异映射到文化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获得的不仅是对研究者的情感共鸣，还是对其文化的深刻理解，这样的理解有助于读者实现文化认同，甚至可以促进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6　自我民族志可能的局限性与应对思维

作为一种较为少见的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的使用还存在着许多争论。结论的普适性是自我民族志可能的“局限”，部分作者在总结自己的研究结论时会强调这些发现带有个人主观理解、受环境因素影响，因此难以确保研究是能被重复的，但考虑到人类社会的主观性与复杂性，涉及到人的主观因素（如认知、情感、行为等）研究并不是总能被重复。但若要以此来质疑自我民族志研究的结论价值是不恰当的，其结论的适用程度因为研究对象的亚文化性质自然而然会受到限制，推广价值可通过引起其他研究人员或从业人员的思考而实现。读者通过比较他们自己的经历与自我民族志作者的经历，可以选择同意或者批判作者的发现，这个过程也是促进领域知识增长、亚文化认可、文化多元化的尊重、知识创新、批判与包容的过程。自我民族志并不是意在构建一个宏大完整的解释性的图景，但它可以为理解某种文化群体的信息运动表象及其背后规律提供标本丰富性的素材，为信息科学领域多元化主体探索在有效满足复杂而有差异的用户个性化信息需求中将抽象的文化因素和不太容易被察觉的主观体验融合到刻板的、标准化的信息管理技术、思维和方法中。信息管理领域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自我民族志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非黑即白的关系，两类方法各有解决适合其特质的研究问题，自我民族志方法更适合发现多元化群体或亚文化文群体不同于普适性理论中所要揭示的共性之外的特殊性因素或关系，为传统信息管理经验、理论、技术和工具的突破与创新带来温度和适用性。

还有学者质疑自我民族志将自我作为唯一数据来源的适当性[6]。事实上，在信息科学领域的实践中，研究者们已经在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增加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从数据收集环节来看，部分研究者并不排斥对客观数据的收集，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自身的记忆来描述故事和归纳理论，也会尽可能地收集与其他人员的对话、电子邮件、相关印刷文件、屏幕截图和视频资料等来辅助故事与理论的构建[7,19]。从数据分析环节来看，很多研究者会借助一些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来帮助自己从客观上审视自我民族志文本，理论如成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论[14]、性别和信息技术的个体差异理论[10]等，分析方法如话语分析[11]、情境分析[25]、解释现象学分析[21]等。需要说明的是，借助已有的理论体系并不是给自我民族志研究带来假设以验证，采用理论的目的是将其应用于自我描述以揭示更多元化的意义和使其更富有普适性，带来解释力度更大、反思更深的研究结果。外部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我民族志研究的主观性，在很多研究中必不可少。

7　总结与展望

叙事方法在信息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受到重视，信息用户研究向经验视角的转换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28]，而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唤起式”的写作实践，其在信息研究中的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对信息科学领域运用自我民族志方法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自我民族志在该领域中出现较晚、研究型文献较少，但主题广泛分布在工作情境、日常生活情境和突发事件的研究中，显示了这一方法有较好的应用潜力。在具体应用方式上，自我民族志的数据来源多样、结果呈现形式自由，自传故事、个人日记、诗歌、视频等表现形式都在信息研究中有所展现。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民族志的优越性能在信息科学领域得到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提升自我有关的信息具体问题的敏感度及其与抽象体系之间的契合度，将叙事与解释作为研究手段为探索信息研究的新兴领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表达上的丰富情感特征容易引起读者的文化共鸣，有利于生成新理论框架与新知识。自我民族志的独特内核赋予其上述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内在局限性：启发式的研究结论使其推广到大范围群体的解释力有限，尽管全面解释本就不是自我民族志研究的根本目标，但研究者在使用该方法的时候仍需注意这一局限以避免误用；以自我为中心的数据来源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特定研究情境中需要精准识别研究问题的属性，并与其他理论方法的结合使用来获得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

总体而言，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一种“唤起式”写作实践，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途径，使其能够参与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进行分析和表达。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我们认为对于解释和分析各种信息现象以及旨在改善用户体验的信息学者来说，自我民族志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图书馆服务的定位与完善、档案管理的发展探索、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信息经验等方向的研究。尽管自我民族志的内在局限仍在持续引起学界的争论，但信息学者还是应当拥抱这类带来新视角新内容的方法论，在学科前沿积极勇敢的探索，发现其他方法难以带来的独特见解。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64-69.

GAO B Z. The three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translator's preface to writing culture[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3): 64-69.

[2] 王彦兵, 郑菲. 民族志方法在图书情报领域中的运用[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6(3): 29-33.

WANG Y B, ZHENG F.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ic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3): 29-33.

[3] GUZIK E. Representing ourselv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ssay on autoethnography[J].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2013, 37(4): 267-283.

[4] REED-DANAHAY D E.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M]. Berg publishers, 1997.

[5] CHANG H. Autoethnography as method[M].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2008.

[6] 蒋逸民. 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4): 11-18.

JIANG Y M. Autoethnography: A new explor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1(4): 11-18.

[7] MICHELS D H. The place of the person in LIS research: An exploration in methodology and representation[J].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library science, 2010, 34(2): 161-183.

[8] LOPATOVSKA I, SMILEY B. Proposed model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in crisis: The case of hurricane sandy[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4, 19(1). [2021-10-3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J1020676.pdf.

[9] KRAMER E H. A close look: Roving reference in a community college library information commons[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20, 48(2): 271-285.

[10] CAIN C C, TRAUTH E M. Black men in IT: Theorizing an autoethnography of a black man's journey into I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 SIGMIS database, 2017, 48(2): 35-51.

[11] BADENHORST C, XU X. Academic publishing: Making the implicit explicit[J]. Preprints, 2016, 4(3): 24.

[12] MCINTYRE J. Blank pages, brief notes and ethical double-binds: Micro digitisation and the infinite archive[J]. Archives & manuscripts, 2016, 44(1): 2-13.

[13] BLACKBURN F. Community engagement,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wo Australian public librarie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J]. IFLA journal, 2017, 43(3): 288-301.

[14] BORDONARO K. Adult learning theories and autoethnography: Informing the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 IFLA journal, 2020, 46(2): 163-171.

[15] COOKE N A. Leading with love and hospitality: Applying a radical pedagogy to LIS[J]. Information & learning science, 2018, 120(1/2): 119-132.

[16] MORRISO K L. Informed asset-based pedagogy: Coming correct, counter-stories from an information literacy classroom[J]. Library trends, 2017, 66(2): 176-218.

[17] DIRNDORFER ANDERSON T.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 as a

way of seeing the experience of care giving as an information practice[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5, 20(1): 170–182.

[18] ANDERSON T D, FOURIE I. Falling together – A conceptual paper on the complexities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s and research gaps in empathetic care for the dying[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7, 22(1): 1–22.

[19] SCHLESSELMAN–TARANGO G. Reproductive failure and information work: An autoethnography[J]. Library trends, 2019, 67(3): 436–454.

[20] JENNIFER D, ALLISON M. From the sidelines to the center: Re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personal in archives[J]. Archival science, 2018, 18(3): 1–21.

[21] GORICHANAZ T. Information on the run: Experiencing information during an ultramarathon[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5, 20(4): 149–160.

[22] HYATT E.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pacific crest trail thru-hikers: An autoethnographic pilot study[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7, 22(1): 1–7.

[23] WALL S. Easier said than done: Writing an autoethnograph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08, 7(1): 38–53.

[24] ELLIS C. Heartful autoethnography[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99, 9(5): 669–683.

[25] DAN G, BARBARA S.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public library[J]. Library trends, 2013, 61(3): 513–541.

[26] RICHARDSON L. Nine poem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4, 23(1): 3–13.

[27] 大卫·费特曼. 龚建华译. 民族志: 步步深入(第 3 版)[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DAVID M F. GONG J H(trans). Ethnography: Step–by–step 3ed[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8] 于良芝, 刘怡君. 现象学、现象图析学与信息用户研究的经验范式——信息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与方法论评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3): 43–57.
YU L Z, LIU Y J. Phenomenology, phenomenography and the experience–based paradigm of user studie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 47(3): 43–57.

From Backburner to the Forefront: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Autoethnography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Field

ZHENG Guangchun, ZHANG Yuhao, YAN Hui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utoethnography offer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lluminating researchers' subjectivity, self-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kind of "evocative" practice, it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in academic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autoethnography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form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superiority of self-ethnography is reflected in research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and its applicability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

Keywords: ethnography; autoethnography; information science field; literature review